

《永乐大典》屡遭劫难的伤心史

经“靖难”夺得帝位并屡次御驾亲征的明成祖朱棣,却集全国之力,投入不可估量的资源,编纂了一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《永乐大典》。虽然其中不乏巩固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动机,但这部旷世大典的修成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,是一部当之无愧的百科全书。然而,这部旷世巨著却命运多舛,火灾、战乱、偷盗、巧取豪夺……正本去向成谜;副本散落世界各地,至今存世不到4%。

散佚之始

据记载,《永乐大典》全书共缮写22877卷,目录60卷,成书11095册,约3.7亿字。《永乐大典》编成后,明成祖朱棣本打算将之付印,但因规模太大、成本太高,当时技术条件无法办到,只好暂放于南京明皇宫文渊阁。永乐十八年(1420年)迁都北京后,《永乐大典》也一同运往新都,原稿本留在南京文渊阁。不幸的是,正统年间南京明皇宫突发火灾,南京文渊阁及所藏之书均烧为灰烬,已运至京城的《永乐大典》遂成孤本。

明嘉靖末年,明世宗下令重录《永乐大典》,至隆庆元年(1567年)完成。于是《永乐大典》遂分正副两种:原本为正本,重抄本为副本。奇怪的是,副本完工后,《永乐大典》的正本也就此下落不明。而且嘉靖后几乎找不到有关正本下落的任何可靠记载,《永乐大典》正本的下落就成了一个谜。

但毕竟还有重抄的副本在。这套《永乐大典》副本存放在北京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宬(音同“成”,指藏书的屋

子)里。这里是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馆。清初,已经有人注意到《永乐大典》的存在。顺治十年(1653年),在内翰林秘书院任职的陈燠受命整理宫中藏书。他在《请购遗书疏》里提到:“惟《永乐大典》一书,藏于皇史宬者,有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。”如果此言不虚的话,就意味着直到当时,《永乐大典》仍旧保存完好,尚未缺失。

雍正年间,由于皇史宬需要恭藏《圣祖仁皇帝实录》,空间不足,《永乐大典》被移贮翰林院。然而,翰林院里行走官员众多,其管理远不如皇史宬成严格。到乾隆三十八年(1773年),为编纂《四库全书》而辑录佚书于《永乐大典》,于是乾隆帝下诏校辑《永乐大典》。大学士刘统勋上奏乾隆帝:“此书移贮之初,本多缺失,现存在库者,共九千余本,较原目数已悬殊。”乾隆五十九年(1794年)十月再次清点时,实存则为9881册(不包括目录)。按《永乐大典》原有11095册,即已佚去1154册,占全书的1/10强。

鉴于其时《大典》已遗失不少,乾隆遂下旨对遗佚《大典》展开查找。有人猜测,康熙年间开馆修书时,总裁官徐乾学、王鸿绪、高士奇等人常在皇史宬查阅《永乐大典》,残缺部分可能尚留在他们家中(徐乾学就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)。乾隆帝遂下令“各本籍地方官,令向各家一为访问,倘果有其书,无论本数多寡,即为缴出送京”。不过,在乾隆眼中,搜集散落民间的《永乐大典》毕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,于是在旨意最后加了句“此并非特交查办事件,只须随便覆奏”。

结果可想而知,此次调查工作毫无收获,就连一本佚失的《永乐大典》也不曾找到。结果,清廷着手修撰《四库全书》时,就不得不面对《永乐大典》只存9/10的现实。

列强劫掠与监守自盗

从修撰《四库全书》开始,《永乐大典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得到朝廷的重视,保存情况也相当理想。可惜好景不长,当《四库全书》修纂完毕后,一些馆臣便视《永乐大典》为“精华采尽,糟粕可捐”的多余之物。清廷对其重视程度随之急剧下降,除了在嘉庆年间编修《全唐文》的时候“以《永乐大典》参校”之外,这部“人间未有之书”基本处于束之高阁的处境。

《永乐大典》在近代的厄运,是从咸丰十年(1860年)开始的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,英法联军侵占北京,大肆烧杀掳掠,攫夺珍贵文物,称为“万园之园”的清代皇家宫苑圆明园,也被侵略者焚之一炬,化为灰烬。在这场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兵燹之灾里,藏于翰林院的《永乐大典》似乎也未能幸免。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第二年(1861年)七月,时任文渊阁校理的翁同龢在翰林院敬一亭见到《永乐大典》。敬一亭一共布置了12个书架,可是“在架者不及架之半”。按乾隆年间尚存9800余册估算,翁同龢所看到的已不及5000册。从时间推断,侵占北京的英法联军应难逃干系。

不过,光绪年间任翰林院编修的缪荃孙在《(永乐大典)考》里却认为,“咸丰庚申(1860年)与西国议和,使馆林立,与翰林院密迩,书《永乐大典》遂渐渐遗失。”按照这种说法,《大典》散佚的主要原因还是当时利欲熏心的官吏监守自盗。

《永乐大典》在书籍中可称是庞然大物,不易拿走。可是翰林院里的贪婪之徒偷盗伎俩却极为巧妙。藏书家刘声木为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,他在《苕楚斋随笔》中记载,有翰林院官员早上进翰林院时随带棉袍一件,打成包袱形状如两本《永乐大典》大小。晚上离院时,此人把棉袍穿在身上,却把两本书包入包袱里。看守人员见到此人早上曾带包袱而来,理应晚上仍带大小一样的包袱

而去,便丝毫不起疑心。

事实上,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盗取《永乐大典》而不被“人赃俱获”,关键原因还是当时的《永乐大典》早已沦为了一块“肥肉”。不仅翰林们盗取,在翰林院典守的官员、役夫们自己也盗取。共同的利益驱使他们和翰林们达成默契:彼此相安,井水不犯河水。正是在这种“默契”中,巨量的《永乐大典》无声无息地从翰林院里消失了。

光绪年间,《永乐大典》从翰林院散佚的速度,简直快得令人吃惊。光绪元年(1875年),翰林院中的《永乐大典》尚有不足5000册。转眼到第二年,居然就少了2/5,只剩下3000余册。而这还是在清廷一度追责,“严究馆人,交刑部毙于狱”的情况下发生的。到光绪十九年(1893年)时,翰林院里的《永乐大典》已只剩下“六百余册”,连完整时的1/10也没有了。

庚子劫难后几乎丧失殆尽

本已在翰林院里命悬一线的《永乐大典》,在庚子年(1900年)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里又遭到致命打击。战事一起,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立即成为清军与义和团的攻击目标,尤以英国使馆首当其冲。1900年6月23日,临近英使馆的翰林院在战乱中起火。“一场顽强的战斗持续到傍晚,那时火焰才被扑灭下去。但在未扑灭之前,构成翰林院四分之三以上房屋的庙宇、考场、藏书室等已被焚毁。”在这场浩劫里,翰林院所藏书籍,包括《永乐大典》残余副本及《四库全书》底本也大多被焚毁或被人趁乱收走。

据查,《永乐大典》副本在庚子年里共被焚毁或流失300余册。事后,英使馆交回330册,但1912年清帝退位后,翰林院将所藏《永乐大典》副本移交京师图书馆时,仅剩64册。至于其余各册,要么就此消失,要么流散民间或国外,于今已成各方争相收藏的珍品。

目前,《永乐大典》在世界各地尚存800余卷,400册左右,这一数字还不到原书的4%。经多年努力,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其中的797卷,为续存这一珍贵典籍做出了最大努力。

综合自《国家人文历史》《海南日报》郭晔旻 金满楼/文

名相王旦善“踢皮球”

“北宋多名相”,不过,所谓“名相”,好些人都是词写得好,名声流传得好,真干工作就注水。而宋真宗年间的王旦,不怎么爱秀,形象普通,却是史家公认的名相。

王旦从小就性子沉默,后来科场登第为官,不管当多大官,都是好脾气。而且他明明拿高薪,吃穿却简单,全家艰苦朴素。正因如此,王旦被好些同僚看不起,尤其是一代名臣寇准,更是常年鄙视他,还总说他办事推诿,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爱“踢皮球”。可事实证明,王旦的独家绝活正是“踢皮球”,这可不是推卸责任,相反却是借力打力!

西夏扯旗崛起,是后来宋仁宗时候的事,但在王旦任职的宋真宗年间,其实就已经龃龉。当时的西夏头领李德明张口就向大宋要百万石粮食,如此嚣张挑衅,大宋满朝暴怒,喊

打喊骂的都有,但王旦却一句话解决问题:百万石粮食?大宋有的是,有本事就来开封拿,我们没义务给你送!这话一说,先前嚣张的李德明立刻服软,乖乖上表认错。

而这精彩“踢皮球”一刻,绝非王旦昙花一现,看他一生官场纵横,表面低调、不乱管,实则选贤任能,好些知名能臣都是他慧眼发现,就连一直骂他的寇准竟也不例外。这情况连当时的宋真宗都鸣不平,一次忍不住跟王旦抱怨:你推荐了寇准,寇准却成天骂你,这都什么事?王旦却哈哈大笑:这说明寇准耿直啊,我没推荐错人!

能踢好皮球,就得有这宰相度量!王旦当政的年代,不太出名,但是国计民生却蒸蒸日上,所谓“富宋”的家底很大程度上都是那年头打下的。

据《大同晚报》张喜/文

